

晚明江南文人园林美学思想的历史价值

谢云霞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摘要]晚明江南文人的园林美学思想富有浓郁的文人色彩,体现出“以人为本”的实用理性主义园林思想新特点。其摆脱了传统园林美学思想之束缚,勾勒和创建了一种艺术化的生活方式,并对清代人们的造园观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晚明江南文人;园林美学思想;以人为本

[中图分类号]TU98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8)04-0114-05

Historical Value of Jiangnan Literati's Garden Aesthetic Thought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XIE Yunxia

(School of Liberal Art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The garden aesthetic thoughts of Jiangnan literati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were rich in literati color, which reflected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eople-oriented garden thought of practical rationalism. It got rid of the bondage of traditional garden aesthetic thoughts, outlined and created an artistic way of life, at the same time had a certain influence on the gardening idea in th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Jiangnan literati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garden aesthetic thoughts; people-oriented thought

晚明时期的政治畸变、经济繁盛、哲学突破以及园林艺术的创造性转化,促使计成、文震亨、李渔等江南文人摒弃重道轻器的传统而空前地活跃于造园艺术领域之中。这些晚明江南文人以其丰富的造园实践经验为依托,以其独特的人生理想、精神意趣与审美追求为基调,撰写了《园冶》《长物志》《闲情偶寄》等一系列有关园林设计与营造的著作。在其造园论著中,晚明江南文人鲜明地表达了他们独具特色、多元相济的园林美学思想,体现出秉持“宜”之理念、尊奉“雅”之品味、崇尚“自然”之境界^[1]、追求“个性”之精神的特质。晚明江南文人作为一个特殊的文人群体,既有丰富的造园经验,又有深厚的文化素质与艺术涵养,是造园实践经验与文化艺术修养兼备的知识精英。其有关园

林设计与营造的著作所蕴含的园林美学思想,摆脱了传统园林美学思想之束缚,勾勒和创建了一种艺术化的生活方式,并对清代人们的造园观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中国园林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价值。

一 对园林文化史的贡献

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向来有“重道轻器”的传统。早在先秦时,《周易·系辞上》就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明确地将“道”与“器”分而治之。而经由先秦最初作为贵族阶层的底层,之后随着社会阶层的流动逐渐从贵族阶层中游离出来而成为“四民”^[2]之首的“士”(先秦诸子百家就是新兴“士”阶层的代表)的演绎(譬如,孔子说“君子

收稿日期: 2018-03-10

基金项目: 重庆市博士后科研特别资助项目“晚明江南文人园林美学思想研究”(Xm2018132)

作者简介: 谢云霞(1985-),女,湖南郴州人,西南大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设计美学与视觉文化。

不器”^{[3]18},子夏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3]225}),古代“重道轻器”的传统得以奠定。在这些“士”的深层意识里,传播知识与入“仕”,即所谓的“道”,才是他们的应有之责;至于建筑和园林等方面的设计与营造,即所谓的“器”,则是工匠之事。

自先秦以来的很长时期里,因文人士大夫持有“不器”之思想,且造园之术需要通过实际训练才能精通其中之道,所以,文人士大夫中很少有人参与到园林设计与营造活动中来,更遑论言及有关造园美学论著的撰写了。而工匠虽然对园林营造之术颇为熟稔,但限于文化水平,他们很难将其园林营造经验行诸于文字,往往只能通过口授手习的方式将其造园经验传诸后世。这样,有关造园的理论 and 美学著作自然也就难以产生了。

至唐宋元时期,随着文化的日益发展与日趋成熟,也因封建社会专制的禁锢,一些有着高超文化水平、深厚艺术修养以及独立思想和人格的文人,为了保持自己相对独立的地位,逐渐疏离主流政治而沉迷于世俗生活之中。为了获得物质的享受,也为了寻求内心的自在闲适,他们往往选择“中隐”之式在城市中营建园林,并且还自得其乐地参与园林设计与营造活动。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当属唐代文人白居易。

首次提出“中隐”隐逸模式且禀赋卓越、艺术造诣甚高的白居易,曾为自己精心设计过四处私园,即“长安新昌坊宅园、渭水之滨别墅园、芦山草堂、洛阳履道坊宅园”^[4];并且还撰写了大量与园林有关的诗文,如《草堂记》《池上篇》《太湖石记》等。这些园林诗文虽然也无意间涉及了有关园林设计与营造的美学追求,如“三间两柱,二室四牖,广袤丰杀,一心称力。……木,斫而已,不加丹;墙,圻而已,不加白。……辄复簣土为台,聚拳石为山,环斗水为池”^[5]等,在某种程度上闪烁着美学思想的光芒,但总的看来,其还只是感性体验式的随笔,而不是对造园经验的理论升华。

宋代李格非《洛阳名园记》、周密《癸辛杂识》《吴兴名园记》等游园随感文章,情况也大致相似。虽然这些较为知名的园记中不乏园林审美见解(譬如“园圃之胜,不能相兼者六:务宏大者,少幽邃;人力胜者,少苍古;多水泉者,无眺望”^[6]等论述),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但它毕竟只是随意而发的感想,因而显得颇为零散,缺乏条理性与系统性,其理

论思辨色彩自然不够丰富。

由上可知,唐宋元时期,有一批文人逐渐突破思想的藩篱而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园林设计与营造活动中来,而且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一些较为精辟甚至颇具价值的园林美学散见,但总体而言,他们的见解还只是感性体验式的,并没有经过理性的概括和升华。

相比之下,晚明江南文人在其《园冶》《长物志》《闲情偶寄》等造园论著中以“宜”“雅”“自然”“个性”为元素所构建的园林美学思想,不仅是对园林设计与营造的理论性阐发,而且富有条理和具有相当的系统性,甚至凝结着中国传统哲学、造物设计观念以及诗文绘画的精髓,这在中国古典园林文化史上开风气之先,占有重要的地位。

晚明江南文人的造园美学论著之所以能够出现,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着丰富的造园实践经验,对造园之道颇为精通,并且有着自己的造园心得与领悟;同时,他们还具有开阔的文化视野与深厚的艺术修养,能够将自己的造园实践经验与造园领悟体会升华到理论的高度并行诸于文字。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当时园林艺术尤其是文人园林艺术的高度发展与全面成熟。换言之,晚明江南文人的造园美学论著,不仅是其自身造园实践经验与造园心得领悟的理性概括与总结,也是明末时期文人园林艺术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就此而论,晚明江南文人的园林美学思想毋庸置疑地标志着我国古代园林艺术乃至整个设计艺术达到了一个新境界。

从事造园实践与理论写作的晚明江南文人,大多是仕途失意的文人。政治上的不得志致使他们回落到世俗生活中寻求心理上的自适。而他们又是一群文化素养深厚与艺术造诣颇高的文人,不仅工于诗文,还擅于绘画;不仅具有创作才能,还富有鉴赏能力。基于此,这群独特的晚明江南文人在造园实践与理论写作中,自然就非常注重文化内涵、艺术韵味与精神追求的融入与贯注。因此,晚明江南文人有关园林的美学思想既是他们乃至晚明文人心态的一种颇为生动和全面的反映,也是他们在园林艺术上的审美理想与诉求。晚明江南文人这种由造园实践经验所生发出来的园林美学思想富有浓郁的文人色彩,形成了特定时空中特殊的文人园林文化——既不同于宫廷园林文化,也不同民间和市民园林文化。

晚明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与文化发展水平为

全国之最,而文人又往往是风雅品格的开创者与践行者,其设计出来的富有浓郁文人色彩的园林作品自然成为市民与民间造园效仿的对象。所以,晚明江南文人在造园实践与理论阐述上所表现出来的审美理想与精神诉求引领了此一时期人们的造园审美取向,对提升此一时期造园审美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晚明江南地区一些拥有雄厚资金的商人为了提高其社会地位与身份,往往聘请文人为其造园,或者让工匠根据文人园林模式来营造园林,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文人园林文化在当时的影响与地位。

二 对传统园林美学思想历史局限性的超越

晚明江南文人在造园论著中以“宜”“雅”“自然”“个性”为元素所构建的园林美学思想,其最终的旨归不在别处,而在于人。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晚明江南文人的园林美学思想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主体思想。晚明江南文人生活在“一个由礼教道学权威及传统所构成的社会逐渐转变为着重个体生命、情欲和现实生活世界取向的时代”^[7],受到明代中叶以降社会上所掀起的追求个性解放、心灵自由的民主思想的影响,他们这种“以人为本”的园林美学思想也出现了一些有别于传统“以人为中心”的实用主义园林思想的新特点。晚明江南文人这种“以人为本”的园林美学思想的新特点,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关注的对象不是抽象的大一统之人,而是具体的实在的个体,尤其是像晚明江南文人这样有着人文理想与情怀的失意文人。

其二,对个体的特性及实际需要所采取的态度不是忽视,而是关怀与重视。例如,晚明江南文人从自身的审美趣味与精神追求出发,要求“林园遵雅”^{[8]171}“门庭雅洁,室庐清靓。亭台具旷士之怀,斋阁有幽人之致”^{[9]18};为了满足园主的世俗生活需求,晚明江南文人在园林设计上秉持“宜居”理念。

其三,设计营造的园林不只是单方面地满足人的物质需要,而且要充分地考虑满足人的其他复杂多样与深层次的需求,尤其是精神需求。譬如,为了满足园主经济节俭的需求,晚明江南文人提出“用之得宜”与“丰俭得宜”^{[10]185}的原则或观念;为了表现人的意趣及精神风貌,晚明江南文人主张园林构筑应“虽由人作,宛自天开”^{[8]51}。

其四,在处理园林营建与人的生活关系上,不是将其隔离,而是将其紧密相连,体现日常生活的审美情趣。譬如:关于园林屋宇大小的设置,晚明江南文人摒弃园主的身位地位等外在条件,提出“房舍与人,欲其相称”^{[10]180}。

晚明江南文人园林美学思想的最终落脚点在于人,在于世俗生活中的个体,其关怀与重视的是个体的特性、实际生活需要以及复杂多样的需求。就此而论,晚明江南文人的园林美学思想从至高的神圣价值回归到了个体的现实生活中,这无疑闪烁着近代人文主义的光辉,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超越历史局限性的特性——因为服务于个体的现实生活与日用伦常是设计的本质,也是近现代设计最为基本的精神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晚明江南文人的园林美学思想始终关注与重视人的深层次需求,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人类中心主义”。事实上,晚明江南文人在造园论著中多次强调园林设计要遵循自然、顺应自然,在遵循与顺应自然的基础上师法自然与妙造自然,体现了“人化的自然”和“自然的人化”的辩证关系。“因”“依”“随”“按”“任”“顺”“合”等观念就是晚明江南文人遵循自然与顺应自然最为充分的体现。

作为文化视野与艺术素养兼备的知识精英,晚明江南文人在园林环境设计中自觉地融入和贯注了文化艺术的审美内涵以及人格理想。他们在尽情享受物质的同时,追求精神的享受;虽执著于世俗生活之中,但又超越于世俗生活,将日常生活与艺术美妙地融合在一起。因而,他们创建了一种既满足于生活实际需求,又适合于消闲遣兴、怡情养性,充满逸趣幽韵与自然雅致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实际上也就是一种艺术化的生活方式。进一步地说,晚明江南文人的园林美学思想从某种意义上已经勾勒和创建了一种艺术化的生活方式,这似乎与当代所畅行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有着某种相通或相近之处。

“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命题最初是由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来的。费瑟斯通认为,消费社会中所出现的给人以梦幻感觉的百货商店、海滨胜地、商业广场以及各种美轮美奂的商品等致使“艺术与日常生活的某些界限坍塌,艺术作为一种商品受到特殊保护的地位被侵蚀……促使人们将注意力投向日用品,并将其当作艺术来看

待”^[11]。21世纪初,当这一命题传入中国后,引起了中国学界相当长一段时期的激烈讨论。“日常生活审美化”,简言之,就是处于消费社会中的人们将审美视域从纯粹的艺术殿堂扩展和延伸至日常生活之中。虽然晚明江南文人的园林美学思想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所产生的时代背景、所涉及的审美主体与对象等各不相同,但二者在以艺术的眼光对待日常生活、将日常生活艺术化这一方面,却是相通相似的。就此而论,晚明江南文人的园林美学思想具有一定的超越历史的进步性。

基于特定的时代境遇与独特的身份,晚明江南文人中虽有人(如计成)将造园作为其生存之道,但他们并未以此作为其纯粹谋求功名的手段,而是将其作为人生价值与艺术追求的实现方式。因此,晚明江南文人在园林设计中所寻求的不是功利性价值,而是功利性价值之外的自我超越、自我闲适与自我完善。以造园作为其生存之道的计成在其《园冶·自序》中就说:“别有小筑,片山斗室,予胸中所蕴奇,亦觉发抒略尽,益复自喜。”^{[8]42}即使是片山斗室这样小规模园林的设计,计成也将其视为一门艺术,竭尽全力地将自己胸中所怀有的人生理想与艺术追求(“奇”)在园林设计实践中充分地发挥和施展出来,从而在其中自娱其情,自得其乐(“益复自喜”)。换言之,他试图在“娱”与“乐”中进一步地发现自己、肯定自己和完善自己,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艺术追求。晚明江南文人这种精神也完全融入与渗透到其园林美学思想之中,成为了其园林美学思想一个极为鲜明的特征。

受当时突破庸常与格套而极力追求自我的与众不同这种文化精神的影响,晚明江南文人无论是在造园理论阐述上,还是在造园实践中所竭力倡导和追求的独具匠心的思想与精神上,均对当时园林艺术由关注技术表现到重视设计创新的风格转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与此相应,晚明江南文人所提出的“三分匠、七分主人”“园筑之主,犹须什九,而用匠什一”^{[8]47}的观点,不仅充分肯定了园林设计师在园林营造活动中的作用,还将园林设计师的主体地位提到了至高的高度,这是千百年来所未闻见者,足可开一代风气之先。

三 对清人造园观的影响

晚明江南文人有关园林的美学思想对清代人们的造园观念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可从曹雪芹

《红楼梦》、钱泳《履园丛话》以及沈复《浮生六记》中略见一斑。

《红楼梦》第十七回至十八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中,曹雪芹借贾政、贾宝玉等众人之口表达了他对造园艺术的美学见解。例如,当贾政领着众人开门游赏大观园时,书中有这样的描写:

只见迎面一带翠嶂挡在前面。众清客都道:“好山,好山!”贾政道:“非此一山,一进来园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则有何趣。”众人道:“极是。非胸中大有丘壑,焉能想及此。”^{[12]219}

“一带翠嶂挡在前面”,这是以门后设置山石的方式来阻挡游赏者视线的做法。对于这种所谓的“障景”造园手法,曹雪芹是颇为赏识的,认为只有胸中大有丘壑的造园家才能想到运用此艺术手法。与此同时,曹雪芹借贾政以及众人之口明确地道出了这种所谓“障景”造园手法的艺术效果:避免园中之景一览无遗(“非此一山,一进来园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给游玩观赏者以无限的遐想,为其增添探幽寻胜的闲情逸趣(“趣”)。

曹雪芹对“障景”造园手法的见解,实际上与晚明江南文人在造园美学论著中所表达的思想一脉相承。计成在《园冶》中就说:“伟石迎人,别有一壶天地。”^{[8]171}所谓“别有一壶天地”,就是通过“伟石”的阻挡,营造一种深远广阔与变化无穷的艺术境界。

又如,当贾政等人进入大观园,透过入门处的一带翠嶂,往前一望,便见一条羊肠小径从藤萝中微露出来,贾宝玉对此题名为“曲径通幽”。贾宝玉之所以如此题名,是因为“此处并非主山正景,原无可题之处,不过是探景一进步耳”^{[12]219}。在此,曹雪芹借贾宝玉之口,点明了园林入门处设置曲径的妙处:“探景”。曹雪芹的这种美学见解亦与晚明江南文人相通。文震亨在《长物志》之“室庐·海论”篇中就明确地指出:“凡入门处,必小委曲,忌太直。”^{[9]37}对于入门处的小径设计,文震亨之所以强调要“小委曲”,不能“太直”,其目的也就是为了展现其曲折美,并扩大园林的审美空间,为观赏游玩者在游玩园林时增添几分情致与乐趣。

由上所述,曹雪芹无论是借贾政及众人之口所道出的“障景”造园手法在园林中所彰显的艺术效果,还是借贾宝玉之口所点明的园林入门处设置曲径的妙处以及所阐发的自然天成的见解,都与晚明

江南文人在其造园论著中所表达的美学思想相一致。因此,曹雪芹有关造园的美学观点或见解,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晚明江南文人园林学思想的影响。

钱泳在其著作《履园丛话》中说:“造园如作诗文,必使曲折有法,前后呼应,最忌堆砌,最忌错杂,方称佳构。”^[13]在他看来,园林的设计与营造同诗文的创作在原理上是一致的:诗文的结构章法讲究起、承、转、合,园林的布局与景观设计亦应讲究曲折变化和前后呼应,不应堆砌和错杂。其实,晚明江南文人早在其造园论著中就明确提出:“人之葺居治宅,与读书作文,同一致也”^{[10]181};“(造园)犹之文章一道,结构全体难,敷陈零段易”^{[10]221}。在造园与作诗文的关系上,虽然晚明江南文人表达得较为笼统,没有钱泳阐释得具体详细,但二者的思想内涵大体上是一致的。就此而言,钱泳的造园见解在某种程度上亦受到了晚明江南文人园林美学思想的影响。

关于造园,沈复在其《浮生六记》中认为设计布置园林中的山石、花木与建筑物等要素时应注重大小、虚实、藏露、浅深、曲直等方面的变化,以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藏中有露、露中有藏,浅中见深、深中见浅,曲中有直、直中有曲等多种艺术手法,丰富园林中的审美空间。他说:“若夫园亭楼阁,套室回廊,叠石成山,栽花取势,又在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或藏或露,或浅或深,不仅在周回曲折四字,又不在地广石多,徒烦工费。”^[14]而晚明江南文人在其造园论著中指出:“大抵虚者实之,实者虚之,聚者散之,散者聚之,险者夷之,夷者险之。……此开园之营构也。”^[15]所谓“虚者实之,实者虚之,聚者散之,散者聚之,险者夷之,夷者险之”,也就是虚中有实,实中有虚,密中有疏,疏中有密,藏中有露,露中有藏,隐中有显,显中有隐。由此可见,沈复的此种造园见解与晚明江南文人的园林美学观念是相通的,晚明江南文人的园林美学思想对沈复的造园观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虽然人们为了舒适惬意地诗意栖居而营建古

典园林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但在城市环境设计日益凸显出绿化观念片面化、人本理解狭隘化、和谐意识匮乏化、多元文化浅薄化等问题的当代^[16],晚明江南文人的园林美学思想无疑具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 [1] 成婧欢. 简析苏州园林之美[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 2016,30(2):53.
- [2] 黎翔凤. 管子校注:卷第八[M]. 北京:中华书局, 2004:400.
- [3]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6.
- [4] 岳毅平. 中国古代园林人物研究[M].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73.
- [5] 白居易. 草堂记[M]//陈从周,蒋启霆. 园综:下册.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1:205-206.
- [6] 李格非. 洛阳名园记·湖园[M]//陈从周,蒋启霆. 园综:下册.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1:171.
- [7] 王树良. “百姓日用即道”思想影响下的晚明设计[J]. 艺术百家,2005(2):134.
- [8] 计成. 园冶注释[M]. 陈植,注释.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
- [9] 文震亨. 长物志校注[M]. 陈植,校注. 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 [10] 李渔. 闲情偶寄[M]. 江巨荣,卢寿荣,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11] 代迅. 西方理论与中国文本:费瑟斯通和李渔美学思想研究[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8(6):110.
- [12] 曹雪芹,高鹗. 红楼梦:上[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 [13] 钱泳. 履园丛话:卷二十[M]. 张伟,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79:545.
- [14] 沈复. 浮生六记:卷二[M]. 俞平伯,校点.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9.
- [15] 祁彪佳. 祁彪佳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60:151.
- [16] 周红惠,向师师. 生态设计艺术研究的风向标:读刘文良《后现代语境下的生态设计艺术》[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0(5):125.

责任编辑:黄声波